

清中期广西的客民及土客械斗

朴基水

(韩国成均馆大学 史学科)

[内容提要] 清中期,由于广东与广西之间的不平等商品交换和广东人口大量地向广西迁移,引起了广西社会矛盾的深化。虽然广东的移民(客民)为广西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出现了,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客民与土著(包括少数民族)间的械斗。由于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大部分客民与天地会、‘海贼’结为一伙,进行了反地方官、反清的活动。自雍正年间开始,广东嘉应州的部分客家不断移居广西东南地区,与土著之间在土地、水利、风水、女人等问题上产生纠纷,导致客民和土著间的械斗。这是广西社会秩序动乱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重要转机。

[关键词] 广西;客民;客家;土客械斗;海贼;天地会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5)04-0059-16

引言

太平天国运动从 1851 年 1 月正式宣布起义至 1864 年 7 月失败共历 14 年,其间成立了对抗清王朝的民众政权,军队达到了数百万人,运动波及到 18 个省,曾占领过 600 多个城镇。那么,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

笔者从多个角度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地域的角度关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起义运动。其中广东、广西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最为严重。那么,为什么在广西民众起义运动比其他地区严重呢?笔者对广西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广西不同于江浙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仍在实行佃农被地主强力支配的落后的地主制。面对地主残酷的压榨,佃户们虽然进行斗争,但由于斗争处于无组织状态,收效甚微。当拜上帝会在广西出现后,佃农们为了从痛苦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纷纷加入了拜上帝

会。另外,广西起义军攻击的对象包括商人和高利贷阶层(主要是广东人)也深受广大佃农的欢迎。这些广东商人对广西住民大肆进行残酷的商业性掠夺和高利贷剥削,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但是,凭以上的观察,还不能断定广西省已具备了足以引起像太平天国这么大规模农民运动的条件,而仅仅是反映了广西的社会现象,即仍在实行倒退、落后的地主制,以及广东商人掌握了广西的流通领域(商业和高利贷业)。还不能断定,广西的社会矛盾比当时经济发达地带的江浙地区或广东地区更为严重。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农民运动呢?

由于广东和广西之间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不平等的商品交换,使得广西的财富流向了广东,这造成了广西社会矛盾日趋严重。这是由于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商品流通而引起的广东矛盾向广西的转移。如果说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商品流通,造成了因物质交流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转移的话,那么,广东和广西之间的人口移动,会不会造成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矛盾转

* [收稿日期] 2005-10-11

移呢?事实上,虽然广东人对广西开发的贡献很大,但同时也加深了广西人口增加和耕地不足的矛盾,从而激化了广东人同广西少数民族、土著汉人之间的矛盾。从广东来的天地会客民或海贼是使广西社会动摇日趋严重的一群人,可以看作是充当了使社会矛盾重叠,激化社会矛盾的角色。另外一类广东客家移住到广西后与当地的土著人之间发生的土客械斗也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梯。

本文对移住广西的广东客民的类型及其属性,他们移住广西后引起的广西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行深入分析。

一、客民

1. 广西的各种客民

客民是“寄留民”之意,即指已离开原籍,移住他乡,但不变更原籍的人。不管这种移动或迁出是自发的,还是强制的,都可以把这种人叫做客民。明清时代,经常用来称呼从外省移住来的汉人为客民。特别是在广西,客民是相对于广西土著的少数民族或以前居住在广西的土著汉人而言的。既可以在主要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称呼全体汉人为客民,也可以在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为了同土著汉人区别,称清代移住到广西的汉族为客民。在本文中,客民是专指清代移住到广西的汉人。另外,客民的概念在史料上同客家混用的情况也很多,在本文中把客家作为客民的一个构成部分来掌握。

19世纪中叶,广西右江道严正基指出,广西土著人口不过3-4成。根据严正基之言推测,广西人口的6-7成为非土著人。1851年至1852年间担任广西按察使的姚莹,也说过:“广西土著民人皆苗、瑶、侗、僮(壮),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外省之客民”。他把苗、瑶、壮族等少数民族视为土著人。严正基的“土著”概念也指少数民族。那样的话,认为广西居住的汉人占广西人口的6-7成也可以成立。^①在占6-7成的汉人中,有多少是在清代移住到广西的呢?刘锡蕃指出:“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来者,约占十分之八”,而“清一代汉人移植之多,远出于历朝之上。”^②由刘锡蕃之言可见,至

19世纪中叶,广西的汉人,绝大多数是由清代移来的。

清中叶以后,广西人口激增^③,其增加指数(1724年100,1851年774)比全国人口增加指数(1724年100,1851年342)^④高出一倍多。从此可见除了自然的人口增加以外还有别的人口增加原因。由于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省份人口较多、而耕地不足,自清代以后,这些省份的人口一直在向广西移动。^⑤这是广西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在广西居住的客民大部分是从广东和湖南来的,从福建、江西、贵州来的并不多。和广东接壤的广西东南和南部地区(梧州府、浔州府、南宁府、郁林州)以及广西西部(镇安府)地区,广东来的客民较多。和湖南接壤的广西东北部(柳州府、庆远府、桂林府、平乐府)地区,以往湖南来的客民较多。^⑥但自明清以来,随着广东经济的发达,广东手工业和商业日趋繁荣,粮食和手工业原料的需要量大增。但本省不能自给,于是,广东商人为了购入粮食和原料,携带盐和手工业制品进入了广西。在这个过程中,广西的商业渐渐被广东商人所垄断。^⑦广东商人不但从广西的东南、南部、西部进入,而且也在广西的东北部进入。除了和湖南接壤的几个县,在广西东北部,广东商人和湖南商人的数量基本相当,但有时广东商人占优势。^⑧此外,随着广东过剩人口不断流入广西,广东籍客民的数量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虽然也有福建^⑨、江西^⑩、贵州^⑪等省份的商人和客民到了广西,但其数量和广东相比较微,故而本文主要以广东籍客民为研究对象。

2 广东籍客民的类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广西人口六成以上的汉人中大多数是清代移住来的客民,其中从广东来的客民(以后简称广东客民)最多。以后涉及的客民指广东客民。有什么原因让广东人背井离乡移住到广西呢?广西地区又具备什么要件接纳他们呢?现在来看看广东的人口流出要因和广西的人口流入要因。

经过考察,流入广西的广东客民有三种类型。

(1) 商人等富裕阶层

广西人一般不从事商业活动^②,即使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也由于资本少,只能在广西省内部从事小规模的商品流通。^③清初,广东商人开始进入和广东接壤的广西东南部一带,乾隆年间,开始大举进入广西。当时在广西有“无东不成市”^④的俗语,说明了广东商人在开辟广西商业方面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从众多粤东会馆的建立看出,清代广东商人在广西的不断增加。戎墟粤东会馆成立于1714(康熙53)年,大乌墟粤东会馆成立于1722(康熙61)年,江口墟(又名永和墟)粤东会馆成立于1791(乾隆56)年,郁林县城粤东会馆成立于1804(嘉庆9)年之前等^⑤。众多粤东会馆的设立,一方面说明广东商人在广西积极地从事商业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东商人商业经营范围的广泛。

如此,广东商人逐渐占据了垄断广西商业的位置,这样的现象在与广东接壤的广西东南地区特别显著。这一地区的广东商人垄断了梧州的柴炭流通业、面条加工业,垄断了桂平县江口墟的蓝布和鸦片流通以及桂平县新墟的蓝收集等行业,^⑥乾隆末年已经控制了广西最大的商业城市戎墟的商业权。比如说广东商人们在1788年花了1万8千多两白银重建戎墟的粤东会馆,他们认为广西省“盖虽客省,人视之,不啻桑梓矣”,“故客于戎者,四方接轸,而莫盛於广人。”^⑦从此可见广东人已经掌握了戎墟的商业权。平南县的大乌墟、桂平县的江口墟也一样。1722年,建造平南县的列圣宫时,广西人只有数十名捐了钱,而广东商人足有600多人捐了钱^⑧,充分表明了广东商人的地位和比重。道光年间,在桂平县江口墟从事商业的人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人已经支配了江口墟的商业权。

通过考察广东商人林氏开创林宝昌的个案,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商人逐渐控制广西商业的过程。林氏家门是1675年从广东番禺移住到广西贵县的。开始,从事小规模的商业经营,后又从事从广东购入土布和故衣卖到广西的省际交易。1754年,广东发生了饥谨,林氏

乘机把广西贵县的米谷运到广东贩卖,获得了很大的利益。随着资本积累量的增大,乾隆中期以后建立了林宝昌商号,用船把广西米谷、落花生、豆子、糖、土产品等运到广东贩卖,又将广东手工业制品如布匹、绸缎、故衣、铁制农具贩卖到广西。并开设当铺,仅在贵县有36间,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仅仅在贵县城就拥有70-80间店铺,并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成为可以收数十万斤的地租的大地主。^⑨乾隆年间,林家树立了巩固的经济基础。在嘉庆年间建立了祖祠,编纂了家谱,开始巩固作为望族的体制,并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即通过捐纳或科举,在道光年间其家族涌现了4名举人和一名进士,确立了在贵县作为绅士的地位。^⑩

这一部分广东客民,在广西通过商业、高利贷业、矿山开发等活动挣了钱后,又多投资土地,成为了地主。比如说,不少广东商人在广西桂平县江口墟和贵县大墟,大量买入土地,成为当地的地主。^⑪还有,在广西南部永淳县等地,不少广东商人在从事代替壮族交纳税粮的业务过程中,获得田地主人的名义,成为了地主。^⑫一方面,贵县银矿的主人中,广东人也很多。^⑬广东商人因为掌握着广西的商业、高利贷业,构成了广西支配阶级的一部分。^⑭

(2) 农民、手工业劳动者

广东客民中的大多数是由于不能在自己的家乡生活下去而背井离乡移住到广西的人群。他们是第二种类型的客民。他们为什么离开广东?清中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而耕地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出现了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现象,广东也不例外。通过表1^⑮可以看出广东的人口在清中叶以后急剧增长。如果1685年的指数为100的话,在1812年就是1728,在1851年就是2559,足足增长了16倍、24倍以上。和1685年比较起来1724年人口数没怎么增加,或许可以说1724年的人口统计数不反映实际数量。但即使把1753年的人口指数看作100,1812年是483,1851年是715,这也是了不起的人口增长。

表 1 清代广东的人口、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

年代	人口及其指数		耕地面积 (顷)及其指数		人均耕地面积 (顷)
1685	1,109,400	100	30,239,255	100	27.26
1724	1,307,866	118	31,247,464	103.3	23.89
1753	3,969,248	358	32,883,293	108.7	8.28
1766	6,938,855	625	33,696,253	111.4	4.86
1786 - 1791 平均	16,175,667	1458	33,548,210*	110.9	2.07
1812	19,174,031	1728	32,034,835	105.9	1.67
1820	21,558,239	1943	34,300,709	113.4	1.59
1851	28,388,716	2559	34,390,309	113.7	1.21

另一方面,耕地面积的增长如上表所示微不足道。和明清交替时期的混乱(南明政权的抗清运动,三藩之乱)结束之后的1685年比较起来,经过了160多年的1851年,耕地面积不过增长了13.7%(415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了:从1685年人均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人均2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如果以清代的土地生产力为基准,人均必须有4亩耕地才可能生活下去。^⑧即使是在土地生产率比较高的华南也需要3亩。^⑨由此可见,1780年代后半以后,广东的耕地面积已经养活不了广东的人口了。粮食不足问题^⑩已经是广东的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大量地从广西、湖南、江西、台湾、南洋等地输入粮食。^⑪

在粮食不足的状况下,如果再遭遇到洪水和水涝等自然灾害^⑫的话,广东下层民众就会破产。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劳动者、流民等为了生存只好流浪迁移,或到广东内的山间地区去进行开垦,或去广州、佛山镇等沿海城市打工,或是去了外省和海外。^⑬去外省的其对象主要涉及到广西、台湾、江西、四川、湖南、陕西等地区。^⑭其中移住到距离近、交通便利且有“田畴广美,……中岁谷入,辄有余”^⑮美称的广西的人口最多。

为了生存而移住广西的广东客民的社会阶层大多数是佃农、雇农、工匠、矿工、担夫、小行商、游民等下层民众。移住广西的广东人中农民出身的游民很多^⑯,他们大体上从事开垦那

些还没被开垦的‘山场’。他们由于没有财力,大体上被地主雇佣开发山地,进行‘佃种’。“数世后其徒(广东客民:笔者)益繁,客主强弱互易”^⑰此外,还从事‘种山’^⑱,就是栽培茶、蓝等商品作物,而从事栽培蓝的特别多。一部分客民自己栽培经营,或者几个人共同经营。大多数的客民都是租来山地小规模栽培蓝或被地主雇佣从事栽培蓝。^⑲在广东省信宜县,招募了数千名拜上帝会成员,1850年起义的凌十八也是在广西省平南县栽培蓝的广东客民。^⑳

这一类客民除了从事农业外,也有从事小规模生意的。在一点资本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成为手工业劳动者、矿山劳动者、担夫等。在制造瓷器的手工业者或从事榨落花生油业的手工业劳动者中也有广东客民,^㉑贵县银矿的劳动者大多数也是生活困难的广东客民。桂平县江口墟的担夫中,广东人也比广西人多。在木匠、石匠、泥匠、铁匠等手工业者中客民也不少。在恭城,有“商贾百工悉出异省”^㉒的说法。在贵县也有“各匠悉用外江者”^㉓的说法。异省人和外江者虽然不是一定仅仅指广东人,但是广东客民不少。总之,广东客民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的佃农、雇农,还有小规模的小商人,没有任何技术、资本的矿山劳动者、担夫以及具备一定的技术和器具的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

(3) 天地会、海贼、起义军

自1800年左右广东最早的天地会组织^㉔诞生以来,到1802年左右,仅仅在广东惠州府的两个县里其成员就已发展到1-2万名。^㉕1802年到1803年间,在广东惠州府归善县、博

罗县发生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天地会起义。^④天地会从中心地广东向广西等地发展。1804年,广东合浦的天地会成员冯老四等,潜入广西博白县,召集了120名博白人组织了添弟会。^⑤这就是广西的天地会组织。

广西天地会的发展是与广东人向广西的人口移动同时出现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由于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广东作为经济中心,其商业经济、商品流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广东和广西之间商人往来也变得频繁了。部分商人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得到保护,参加了天地会。广东的没落农民、佣工移住到广西后,加入天地会的也很多。如1809年在广西桂平县由于组织天地会而被逮捕的广东高要人马胜忠等过去是靠“耕种度日”^⑥的人物,被认为是从广东移住到广西的没落农民。1806年,在广西平乐县组织天地会的张世聪是广东德庆州人,在平乐作为佣工谋求生计^⑦。1807年在广西上林县组织天地会的周宗胜是广东南海县人,在上林作雇工^⑧,是广东客民。

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在福建、广东海岸上活动的“海贼”受到了清朝政府的镇压而被赶了出来,他们通过珠江进入广西。这些“海贼”大部分是天地会的成员。^⑨嘉庆十二年(1807)以后,被清政府大量挤压出广东的“海贼”大量拥入广西^⑩,随之在广西正式组织了天地会。^⑪1814年左右,广东海贼进入广西后在广西公然进行“掠夺”^⑫。

1820至1821年之间,在广西一部分地区,天地会的集团行动或不法行动等小规模起义现象也与广东起义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⑬1836年,“广东会匪犯案后”,躲避到广西西隆州,同当地的“土恶”相勾结,“结党成群”,“扰害阊阎”。^⑭鸦片战争之后,广东起义势力对广西社会的影响相当大。其中之一是在广东解散的乡勇。鸦片战争时期,为了对付英国的侵略,广东当局组织了水陆义勇,有3万6千多名。^⑮战争结束后,他们被政府抛弃了,勒令解散。因为武器没有被收,其中变成“盗”的人很多^⑯,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盗风”。当时两广总督耆英竭力镇压他们,而广西巡抚郑祖深反而忌避镇压

“盗”,使得起义势力把广西当作他们的巢窟,流入广西进行活动^⑰。他们活动的地区不但包括了广西东南部的梧江和浔江流域,而且包括了广西西南部的南宁府、太平府地区,他们和广西省的土匪及从湖南、江西、福建来的游匪结合到了一起。^⑱

我们把上述的天地会、海贼、乡勇看成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因为他们在广西滞留期间都必须维持生计。他们一般被称为“广匪”(从广东来的匪贼的意思)。广匪在1840年代对广西地区的民众起义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广匪进入广西地区后独立的进行起义活动,或与广西土匪联合进行活动,把广西民众起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广西独立活动的广匪共有15个势力。^⑲他们主要在广东和广西的接壤地区或在容易使用西江河运的地区活动。广匪和土匪联合起来引起的起义事件达到了17件。^⑳广匪和土匪联合引起的起义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广西民众起义,如)嘉祥起义、罗大纲起义、)钊和田芳起义、何明科起义等。因为广匪和土匪联合起来了,使得广匪可以在广西全域活动,有效的发挥了广匪的战斗力和在很多土匪的援助下起义军的规模变得更壮大了。

3 广西当局的客民对策

综上所述,大多数的客民(特别是第二种类型)受到地主、商人和高利贷剥削,受到矿山主和手工业主的使役,受到官吏的压迫。因而,他们自发地站在反官、反地主的立场上,与外部进入的天地会、“匪徒”结合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官府于嘉庆年间对广东的海贼进行了扫荡,海贼为了躲避镇压进入广西,与客民联合起来进行活动,进而又与土著民(“本地愚民”)结合起来组织了天地会。^㉑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担任广西巡抚的赵慎畛逮捕了1700多名群盗,发现其中7至8成与外省主要是广东省客民有关系,因此加强了对客民的管制。^㉒道光元年(1821年)制定的《乡约条规》,针对客民和“匪徒”串通的可能性,劝告约长、隣人要注意客民的举动。^㉓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1830年在桂平宣里发生干旱,从广东潮州、惠州来的恶匪(客民),和“土著积匪”、“游匪”

(广东的匪徒)联合起来,以‘分谷’的名义进行掠夺。^[4]另外鸦片战争结束后,失业的乡勇进入到活动便利的广西后,首先和客民结合起来了。^[5]

一部分本来就是天地会、‘匪徒’的客民,渗透到广西的土著民社会,同下层民众结合起来,发展天地会,组织起义运动;或者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同那里的民众结盟,举行起义。1810年左右,客民把土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运动。^[6]1811年,桂平县有客民策划起义,事前被发觉而遭到镇压。^[7]1820年左右,以广东人为中心的‘异省匪徒’潜入广西,和广西土棍勾结起来,扰乱广西的治安。^[8]这些‘异省匪徒’即是客民,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天地会的势力。1830年广东流民和广西的乡民一起掀起了在浔州府、平乐府等地的抢米运动。^[9]

对于以上客民的活动,1850-1851年间担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说:“客民皆寄食其地,良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10]客民同壮族很早就开始交流了,到了道光年间,和‘不务本业’的壮族联合频繁制造掠夺事件。^[11]1840年代末,客民与壮族联合起来在广西西南和西部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广西当局认为,客民是‘不安分者’,也应是受土著支配阶层(绅士)进行管理的人。^[12]因此,通过保甲或乡约制,把客民编入其支配秩序以预防民众起义的发生和阻止它的发展。嘉庆末道光初(1818-1822),担任广西巡抚的赵慎畛强化了保甲制,安排客长管制从事农业和商业的客民,只有在矿山或手工业作业场有保证人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客民劳动者,凡是单身流浪的客民、游民全被遣返回原籍。^[13]

1821年制定的《乡约条规》也可以看作是赵慎畛的关于客民、天地会对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对付外省的‘匪徒’潜入广西,同‘土棍’勾结扰乱广西的治安,整顿户籍,组织团练,实行乡约制。^[14]当然这里的外省匪徒就是指以广东人为中心的客民,也就是天地会的成员。1828年,根据周炳绪的奏折,道光帝命令广西巡抚苏成额,对移住来广西的外来游民进行严密的调查,编入保甲制度。即对在广西各地种

山的客民的身份进行调查,对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人一律遣送回原籍,把剩下的客民的名字、年龄、籍贯记载下来,同时编入到保甲制度中,把其中诚实的人任命为客长管制他们,以确保不发生什么事。^[15]

1835年,桂平县制定了安良约。^[16]安良约的内容是,收100石地租的地主或播种1000斤种子的富农^[17],要捐2两银子作为安良约的基金,用来对付凶作和捕盗。同时让子弟精通武艺,指挥壮丁,以‘才智之士’或‘殷实之家’为中心,组织保甲。1830年,在桂平宣里一带,发生了广东客民和‘土著积匪’、‘游匪’联合起来制造的抢米事件^[18],于是当地的支配阶层重新改编了过去的保甲制,重建已经瓦解的乡村秩序。^[19]1842年左右,在桂平永宁墟,‘外匪’与‘里中匪徒’相结合‘扰乱’社会^[20]。该地区的支配阶层为了对付这一问题,并行团练、保甲、社仓制度。因为在桂平一带,光依靠安良约的方法不能重建瓦解的乡村秩序,^[21]通过社仓制度企图救济贫民,保证农业再生产^[22],另一方面企图依靠团练进行武力镇压。但是,至1840年代后,起义的不断发生,证明上述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二、客家和土客械斗

1. 客家

移住到广西的客民中有一个特定的集团叫客家。史料上有客人、客家、来人等用语,这些用语虽然一般指客家^[23],有时指客民。^[24]根据罗香林,西晋末永嘉之乱成为阶梯,开始南下的汉族的一派经过几个阶段多次迁移了居住地。^[25]

在第二次迁移后,中原汉人居住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间地区。经过了五代和宋代,他们渐渐具备了同一般汉人相异的语言、风俗、习惯。^[26]即在三省交界地区,这些客家,虽然被五代十国的楚、南唐、闽、南汉四国包围,但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王朝,在严重紧张的情况下,形成了自身的同质性。^[27]第三次迁移后,明时期在广东嘉应州永久定居的客家同一般汉人语言、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越来越严重,形成了‘客家’的宗族集团(ethnic group)的特性。^[28]明末清初,广东的一群客家开始移住到广西。^[29]主

要在雍正、乾隆年间以后,广东嘉应州的一部分客家开始在广西的东南一带居住。^⑩在广西,客家的居住地区根据 1930 年的调查共有浔州府的武宣、平南、桂平、贵县,梧州府的藤县,郁林州郁林、陆川、博白、北流,平乐府的贺县,柳州府的马平、柳城、象县等 13 个县。^⑪1922 年左右,广西客家的人口,大概有 101 万 6 千多名。这些客家占上述 13 个县总人口的 3 成。^⑫

在广西居住后,一部分客家渐渐致富上升为地主、商人。例如,贵县的客家丘姓是可以收 1050 担地租的地主,温姓是可以收 950 担地租的地主。牛运村的何家、朱家,那良村的刘家也是可以收 300 多到 1 千担地租的客家地主。武宣的叫林发堂的举人也是客家,是可以收 800 到 1000 担地租的地主。^⑬紫荆山的大地主温宏开也是客家。^⑭明末移住到广西的客家人,莫村的傅氏作为桂平县支配层的一员为了编纂桂平县志捐赠银两,也参加了桂平县金田地区乡村秩序的维持机构安良约。^⑮反对拜上帝会的偶像破坏活动,到官署控告冯云山的桂平县紫荆山地区的秀才王作新也是客家。^⑯但是,在广西客家全体中拥有这样经济地位的人只是少数。

大部分的广西客家仍然是贫困的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小商人。客家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广西的原因是因为广东自身人口过剩而土地不足。所以来广西的客家们经济情况特别恶劣。而且因为原来广东客家们的经济地位也很低,大部分是佃农^⑰,理发师、木匠、泥匠、石匠等手工业者,车夫、苦力等单纯劳动者。^⑱因此移住到广西的客家由于没有土地而向土著地主租土地成为佃农^⑲,有的成为贵县银矿的矿山劳动者^⑳,有的成为挑东西卖给货物的行商^㉑,有的以发豆芽、腌盐酸菜出卖为生。^㉒即作为佃户、矿山劳动者、小行商艰难的维持生活的人很多。这样的现象在后来移住到广西的客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先前移住来的客家通过客家特有的勤俭和农业技术成为了中小地主。^㉓但是,后来移住到广西的客家,一般只能在狭小的山间土地耕种,而且还受到那个地区的土著人的歧视。所以天地会很容易融入他们中间,这些客家终于积极加入了广西天地会起义。^㉔像这样客家移住到广西后加入天地会的

情况虽然很多,在广东居住的时候就已经同天地会有联系的情况也很多。1801 年左右,在客家居住地广东潮州府一带,天地会起义势力足足达到了 4 万人,到了 1803 年才被镇压。^㉕像这样,天地会在广东客家中已经扎下了根,由此可知,移住到广西的客家中天地会成员也不少。

2 土客械斗

土客械斗是在华南一带盛行的械斗^㉖的一种。械斗盛行的地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还有湖南、江西、浙江、广西等。^㉗

在广西,土客械斗(或土客斗争、来土斗争),是指土著人和客民(主要客家、来人)之间发生的一种先住民和移住民之间的纷争。械斗主要是共同体之间或同族集团之间的纷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械斗所体现的阶级对立的因素不多,而民族对立、宗族对立的因素很强。^㉘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广东的客家正式开始移住到广西是清朝雍正年间。但是,通过前面的表 1 所看到的,清代广东的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 3 亩以下是 18 世纪末,即乾隆后半期以后。18 世纪末,广东地区全面处在人口过剩的状态,客家的主要居住地广东东北部一带(广东嘉应州)也是一样。处在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状态下的广东地区的住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向外省移住。广东过剩人口向广西的移住至少是进入 19 世纪后才大量出现的。广东客家向广西的移住也是一样。

19 世纪后移住到广西的客家在广西还没有经济基础,处境很恶劣。好的土地已经被土著人和先住民所掌握,只剩下山间狭小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留给新移住的客家。他们只能租种土著人的土地或成为矿山的劳动者,或做小本生意。而且,由于土著人欺生,他们受到歧视,被乡村共同体排斥。^㉙这样客家渐渐同土著人产生对立。

一方面,很早就进入广西,经过长期的努力上升为地主、商人、高利贷主的一部分客家对土著人进行严重的剥削。土著人对客家地主、客家商人产生了敌对情绪,并渐渐发展为对全体客家人的敌对情绪。例如,贵县的客家丘古三借给土人(土著汉人)钱,如果土人还不起钱,就该用土地偿还,通过这样的方式丘古三获得

了可以收 1050担地租的土地^⑫。武宣的客家林发堂因为是举人出身,早就开始了官僚生涯,驱逐那羊村的壮族,并霸占他们的田地。^⑬这样一部分客家地主的行为引起了土著汉人和壮族的反感。他们对客家地主的敌对情绪不仅仅局限于对客家地主,而且也对别的一般客家也有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土著地主(先住地主)因为感到了客家地主的进入,使自己丧失掉了一部分既得利益,因而打算驱逐客家。土著地主谢姓与客家地主章昌辉一家的对立就是一个例子。新移住的客家佃农,凭着特有的勤劳性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抢去了土著佃农的佃权,当中又融入了宗族的感情对立,使土著佃农对客家佃农怀有敌对情绪。^⑭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土著人的排他、攻击态度的客家,在客家内部不管阶级差异,要达成作为客家的一体性、团结性。^⑮因此,客家成为了土客械斗的主要主体。土客械斗中的另一方主要指在广西先住的汉族,也指壮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有时与客家敌对,有时与土著汉族敌对。

19世纪中叶,在广西发生的械斗可以整理为下面的表 2。在广西发生的械斗以土客械斗为主。土客械斗在客家和土著汉人间发生了 4 起,在客家和壮族之间发生了 3 起,这两种情况是广西土客械斗的一般样式。但是土著汉人和壮族之间也发生了 2 起械斗,少数民族和新移住的汉族^⑯之间也发生了 2 起械斗。这两种械斗,从广义上看,是先住民和移住民之间的纷争,可以属于土客械斗。例如,武宣县东乡的土著汉族地主刘孟三因为抢占了壮族的土地,所

以壮族和土著汉人之间发生了械斗。械斗发生之前,地主刘孟三宰了猪带着酒收买刘姓的农民们,如果打赢了就给他们赏钱。^⑰还有 1842 年在阳万县发生的土客械斗中,对客民的高利贷剥削怀有不满的土人(壮族)攻击客民,杀死了 59 名客民。^⑱

土客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域是客家、土著汉人、壮族杂居^⑲的浔州府的贵县、武宣县等。特别在贵县,其发生的频率很高。所以为了能在械斗中获胜,每个村落都配备了武装。土客集团往往向起义势力转变的可能性也不小。1851 年,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认为,在贵县小规模股匪很多是因为土客纷争转变来的^⑳。土客械斗发生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土地的争夺^㉑、水利问题、坟墓等风水问题、女人问题、琐碎的吵架等原因。^㉒

土地争夺问题在土客农民之间发生,也在土客地主之间发生。根据情况,不光是土客之间的矛盾,在土著人地主和农民之间,客家地主和农民之间也发生这种情况。^㉓这可以看作是阶级矛盾。有时,由于汉族地主和壮族农民之间的民族矛盾发生。像这样在土客械斗中不光是土客间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很多。

在广西活跃的起义势力中,也有从广东来的(广匪),他们有时在土客械斗中偏向客家一方。例如,1850 年在贵县发生一次土客械斗,广匪陈香^㉔、钟阿春、杨捞家等的势力偏向客家同土人争斗。^㉕1850 年在贵县、桂平县一带发生的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加入了拜上帝会,成为太平天国发展的一个阶梯。

表 2 19 世纪中叶广西的土客械斗事例

时期	地域	斗争集团	原因	其他内容	根据史料
1830	广西一	村落间的械斗	山场地亩争夺	千百为群	《宣宗实录》卷 79
1842	阳万	客民 < 壮族	客民的高利贷剥削	壮族杀害 59 名客民	《宣宗实录》卷 378
1844	田州	少数民族 < 客		賓州土匪 500 名也参加	光绪《武鸣县图经》卷 7 (《广西》,第 16 页)
	武宣东乡	土著汉人 < 壮族	抢占壮族土地	地主收买农民	《调查资料》,第 44 页。
道光年间	贵县庆丰	土著汉人 < 壮族农民、客家农民	水利问题。土著人掌握水库		《调查资料》,第 42 页。

道光年间	贵县	客家地主 ⇐ 壮族	剥夺壮族佃权		《调查资料》, 第 42 页。
道光年间	贵县庆丰	土著汉人 ⇐ 采人	水利问题		《调查资料》, 第 42 页。
道光年间	贵县大墟	客人 ⇐ 壮族	地主之间竞争性的土地买入	地主诱发械斗	《调查资料》, 第 15 页。
道光年间	贵县赐谷	土著汉人 ⇐ 采人	水利问题	官绅引起械斗	《调查资料》, 第 40 页。
1850	贵县	土著汉人 ⇐ 客家	客家地主用高利贷集中土著人的土地。女人问题。	壮族支援土著汉人。客家失败后, 加入太平军	《调查资料》, 第 3、4、42 页。民国《桂平县志》卷 33, 第 1262 - 3 页。
道光年间 咸丰初年	武宣	客家 ⇐ 壮族	客家地主依靠权势抢占壮族土地。		《调查资料》, 第 44 页。

三、客家和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⑬指导层主要是客家,拜上帝会的构成人员大多数是客家,这就充分说明了客家在拜上帝会中占据的比重和地位的重要性。

在太平天国早期,可以说指导层的六王中除了西王箫朝贵,其他五个王都是客家。^⑭天王洪秀全是客家的事实,当时洪秀全(宗谱名仁坤)的堂弟洪仁一(两个人的五世祖一样)^⑮向瑞典出生的巴色(Basel)福音教会传教士韩山文(T. Hamburg)口述加以证实^⑯。根据《洪氏宗谱》^⑰和实地调查^⑱,洪秀全明显是客家。洪秀全进入广西,最早打算去传教的贵县赐谷村也是和他语言互通、文化和风俗一样的客家的居住地。^⑲南王冯云山,他的祖上从广东龙川县移住到广东花县,龙川县是客家的居住地区。^⑳冯云山在广西进行传教活动所经过的地区基本都是客家的居住地区,他投宿的人家或帮助他的人家也基本是客家。他在广西浔州府城南門里的张老水家里住了大约 50 天,张老水就是客家。冯云山进入紫荆山之前居住在古林社的曾槐英家,曾槐英也是客家,在紫荆山大冲把冯云山聘用老师的书馆的主人曾玉珍也是客家。^㉑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也是客家。清朝雍正年间,他的曾祖父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了广西。冯云山向杨秀清传教,是因为冯云山所依托的客家地主和杨秀清是姻戚关系^㉒

关于北王韦昌辉的民族成份,有壮族和客家两个说法。根据 1954 年太平天国文史调查

团的实地调查^㉓、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的实地调查^㉔、黄现潘^㉕等,韦昌辉是壮族。其证据是韦昌辉和他的家族使用僮话(壮族语),他不愿意使用骂壮族“僮牯佬”这句话。但是主张韦氏是客家的论者们(罗尔纲、郭存孝等)认为韦氏因为在壮族居住地生活很久,学会了壮族语,在平时使用客家方言。另外如果看韦氏族谱或韦氏简谱可以知道韦氏是从广东广州府移住到广西的客家。^㉖翼王石达开的祖先是在乾隆 50 年(1783)前后^㉗从广东省和平县移住到^㉘广西贵县的客家(采人^㉙)。只是他的母亲是壮族,姐姐嫁给了壮族,另外他也娶了壮族女性为妻子。^㉚

拜上帝会创建后,在广西许多地区进行活动^㉛,很多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当然加入拜上帝会的人也有土著汉族和壮族^㉜等少数民族,但客家人数最多。这主要因为拜上帝会的创立者和组织者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客家,同时也因为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迫使客家大量加入拜上帝会。加入拜上帝会的客家主要是贵县紫荆山地区或陆川的贫苦农民^㉝、在紫荆山和平隘山烧炭的人^㉞、贵县龙山的矿山劳动者。^㉟他们平时受到地主、矿山主、商人等的掠夺和剥削,因为他们处在穷困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所以很容易对拜上帝会提出的平等理念产生共鸣。道光二十九年以来,在贵县土著人和客家之间持续发生械斗^㊱,1850 年 10 月,客家富者温阿玉打算纳同土著汉人订婚的壮族女人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抗,在客家和土著汉人之间发

生了大规模的械斗。^⑮一开始客家占优势,随着加入械斗的土著汉人越来越多,客家渐渐处于不利地位。客家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许多无家可归的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受到了拜上帝会的保护。约 3000 的客家^⑯同时加入^⑰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势力得以壮大,就是“使金田起义成为燎原之势的一件动力”^⑱。

一开始,拜上帝会对于这次械斗好像是采取中立的态度。根据洪仁一的自述,有“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⑲这句话。洪秀全作为客家有许多次被歧视的经历,但是他并不想对土著人采取报复。反而本着“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⑳的信仰,否定客家受本地人的歧视。如果接受上帝教^㉑的教理,不管民族、地域、男女、老少、土客,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拜上帝会。实际上拜上帝会除了客家以外,也有土著汉族或壮族等少数民族加入。所以拜上帝会对于当时发生的贵县土客械斗采取中立。

和拜上帝会领导层的这种主观意志不同,拜上帝会成员的大多数是客家。金田起义当时,成员包括家属达到了约 2 万^㉒人,其中客家的数量,紫荆山的烧炭翁(300 家)和农民(山民)约 2 - 3 千,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等的教徒约有 2 - 3 千,贵县的矿山劳动者有 1000 多名,陆川和博白的农民约有 5 - 6 千,在贵县械斗中败北的约有 3 千,苏十九率领的 1 - 2 千等^㉓,总计 1 万 4 千名以上。这么多的客家参加金田起义是因为广东客家洪秀全、冯云山等主要在客家居住地区活动^㉔,利用同样的客家这一点,吸引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同时因为客家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很恶劣,很容易接受拜上帝会提出的教理。

如上所述,拜上帝会最高领导层的大多数是客家,拜上帝会组成人员的大多数也是客家。所以,在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拜上帝会的性质或活动的时候,不可以疏忽客家的问題。

结 语

广东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广西的结果是使广西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广东社会经济矛盾的深化引起了

广东人向广西的移住。广东客民的第一种类型是广东商人。他们解决广东粮食不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把广西的米谷运到广东,从而引起了广西的米谷不足和米价上升,进而产生了广西民众抢米和阻米的斗争。可以说,他们在解决了广东粮食不足问题的同时,又造成了广西的粮食不足,由此引发了广西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他们通过商业和高利贷残酷地剥夺广西民众,成为广西民众起义军经常攻击的对象。第二种类型是下层民众。因为广东的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导致自身生存困难,为了生计,他们移住到了广西。由于他们到来,在广西也引起了佃耕条件恶化的问题。这是广东社会矛盾向广西的转移,造成了广西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三种类型是广东的天地会、海贼、起义势力,其自身也是广东社会矛盾的产物。他们流入广西后激发了广西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鸦片战争之后,广西民众起义斗争之所以风起云涌是上述种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客民的一种客家同第二种广东客民处在一样的状况下。即广东的社会矛盾深化的结果使客家为了生计移住到广西,移住广西之后激化了和在广西居住的本地人(土著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引起了客家和本地人之间的土客械斗。曾经在广东存在的土客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在广西再现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广东的社会矛盾转移到了广西,而且这些社会矛盾又处于不断的激化过程中,从而使拜上帝会组织得以产生,壮大,结果是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当时民众起义运动在直隶、山东、江苏、广西、贵州、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广东等地发生。《大清文宗显皇帝(咸丰)实录》卷 7, 9a - b 道光 30 年夏 4 月丙寅条。

“近日盗匪之多,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于无处不然,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梁同新上疏》道光 30 年 3 月,民国 20 年《番禺县续志》卷 19, 16b (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967),第 246 页。

朴基水,《19 世纪前半期中国广西的地主制和抗

租》,《成大史林》(韩国)第7辑,1991。

朴基水,《清中叶广西商业和广东商人》,《京畿大学校论文集》(韩国)第33辑,1993。

广东的粮食不足问题(引起社会矛盾的原因之一)的解决途径为从广西购入米谷。另一方面,出现了由于广西米谷流出而引起米谷价格上升的新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米谷流出的阻止(阻米)和米谷的强卖和掠夺(抢米)的民众斗争。这可以看做广东的社会矛盾向广西转移的后果。具体的事例参照朴基水以上的论文,1993,第131-133页。

中川学,《中国客民の世界へ》,《一桥论丛》第73卷第4号,1975,第71页。

在有的地区,土民是指少数民族,自然除少数民族外都是客民。另外在有的地区客民指清代移住的外省人。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85),第278页。

稻田一,《太平天国前夜の客民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古屋大学)11,1986,第64页也把移住民和客家统称为客民。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1兵政20,1b(葛士浚辑,光绪14年,台北,国风出版社影印本)下,第380页。

戴钧衡,《草茅一得》上卷,《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68页。以下简称《文献史料》。

⑪这和1982年的人口统计也符合。据1982年的统计,广西的汉人占广西全体人口3642万名的62%,有2249万名,11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广西全体人口的38%,有1393万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广西少数民族》(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95页。

⑫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第4页,第224页。

⑬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78,第258页。甲表82,第262页。1724年101万(丁数的5倍),1749年369万,1767年471万,1812年731万,1851年782万。

⑭通过梁方仲编著上书的内容(甲表78,第258页。甲表82,第262页。)制定。

⑮另外人口增加的原因是在镇压南明政权后朝为了开垦荒地和推动人口增加做得努力的,还有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域通过改土归流的实行,把少数民族也编入起来户籍。

⑯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第380页。

⑰拙稿,《中叶广西商业和广东商人》,《京畿大学校论文集》第33辑,1993,第121-148页。

⑱黄滨,《明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编辑部,《复印报刊资料F7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3年第1期,第97-102页再收录]。

⑲康熙年间,福建人把福纸的制造技术传播到广西容县,并在那里设立了手工业造纸工厂,1850年左右,在广西荔浦县城设立了福建会馆。乾隆《梧州府志》卷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61页]。民国3年《荔浦县志》卷3[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65页。以下简称《广西》]。1850年,福建商人为了对付起义势力的抢夺,成立了称为福团的自卫武装组织。

⑳雍正年间,广西南丹土州的矿工中有江西人,江西商人也桂林府临桂县活动。田²,《陈粤西矿厂疏》(雍正5年),《皇朝经世文编》卷52(贺长龄辑,台北: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63),第1351页。光绪6年《临桂县志》卷12风俗,2a(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第183页。

㉑在广西和贵州的境界地区,有一部分贵州籍客民。戴钧衡,《草茅一得》上卷,《文献史料》,第368页。

㉒同治12年《梧州府志》卷3风俗,2b,第79页。“民之近山者樵,近水者渔,不营商贾”,光绪10年《平乐县志》卷1风俗,48a(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第34页也说到“家鲜储蓄,不事商贾”可以说明广西人一般不从事商业。

㉓民国13年《陆川县志》卷4,23a(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第77页说到“业商者,资本甚微,向祇在本土贸易,不能出百里之外”。

㉔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第16页。(以下简称《调查资料》)

㉕戒墟:《重建戎墟会馆记》乾隆53年11月,《调查资料》,第254页。在平南大乌墟康熙61年(1722)建立了列圣宫,1750、1783、1805、1811年再三重修,那时每次为了广东商人的团结起了粤东会馆的作用。(《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康熙61年,《增建列圣碑记》乾隆15年,《重修列圣宫题名碑记》嘉庆16年,都是《调查资料》,第256-258页所收录)在桂平县江口墟和大宣墟两墟的粤东会馆于乾隆56年

- (1791)在江口墟被筑造。在大宣墟建立会栈。(《创建粤东会馆序》乾隆 56 年,《调查资料》,第 249 - 251 页。)郁林县城:《供奉祀典捐例碑记》嘉庆 9 年,《调查资料》,第 254 - 255 页。1804 年建立的碑石属于郁林县城的粤东会馆,粤东会馆建立当然是在这之前。根据《调查资料》(第 20 页)在郁林的大平山墟也有粤东会馆,但不清楚建立年代。
- ②⑥《调查资料》,第 16、26、31、32 页。
- ②⑦《重建戎墟会馆记》乾隆 53 年 11 月,《调查资料》,第 253 - 254 页。
- ②⑧《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康熙 61 年 11 月,《调查资料》,第 257 页。
- ②⑨《调查资料》,第 28 - 30 页。
- ③⑩西川喜久子,《广西社会と农民の存在形态》,《讲座中国近现代史》1.《中国革命の起点》(野泽丰、田中正俊 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第 145 - 153 页。
- ③⑪《调查资料》,第 3 页。另外,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第 11 页(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 ③⑫他们被当做种种‘富客’,具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小封,《抗租記》,《广西》下,第 328 - 329 页。
- ③⑬《调查资料》,第 24 页。
- ③⑭明心道人的《发逆初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4(台北,鼎文书局,1973),第 451 页]指出“客民系粤东潮郡所迁,读书是务,紳士居多。土民..业农者多。说明一部分客民的社会地位很高。
- ③⑮利用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 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甲表 82、乙表 61、乙表 70 - 77 综合制定。
- ③⑯戴逸 主编,《简明 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 347 - 348 页。
- ③⑰陆仰渊,《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的人口与土地问题》,《太平天国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 172 页。
- ③⑱除了广东的人口和耕地比起来相对过剩这一原因,广东军队、官僚、商人、手工业劳动者等非农业人口(消费粮食的人口)很多,广东农民专心栽培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可以获得高利润,因而减少了粮食的栽培面积,这也引起了广东的粮食不足问题。拙稿,《中叶广西商业和广东商人》,《京畿大学校论文集》第 33 辑,1993,第 127 - 128 页。
- ③⑲徐晓望,《代前期广东福建两省的粮布消费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26 页。
- ④⑰根据水力电力部水管理司 等编,《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 12 页,
- 1736 年到 1911 年之间,珠江和韩江水系的广东各州县遇到洪水和水涝的次数达到了 20 次以上。比如高要和南海各 55 次,番禺 52 次,三水 43 次,高明 42 次等。吴建新,《明 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 ④⑲吴建新,《明 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 ④⑳郭松义,《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史论丛》第 5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4)。
- ④㉑《重建戎墟会馆记》,《调查资料》,第 253 页。
- ④㉒《大 宣宗成皇帝(道光)实录》卷 135,23b 道光 8 年 4 月庚寅条。以下简称《宣宗实录》
- ④㉓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 2(《广西》上,第 45 页)
- ④㉔《宣宗实录》卷 135,23b,道光 8 年 4 月庚寅条。
- ④㉕《调查资料》,第 27 页。
- ④㉖《徐广缙叶名琛奏稿》,《末 的秘密结社》资料篇(佐佐木正哉 编,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7),第 208 页。
- ④㉗姚莹,《赵文恪公行状》,《续碑传集》(缪荃孙 纂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3 辑,文海出版社,卷 22,5a. 客民中有“矿厂窑榨佣丁”。这里窑榨佣丁是指制造瓷器的手工业者和从事榨落花生油 的手工业劳动者。
- ④㉘光绪 15 年《恭城县志》卷 4 风俗,39b(台北,学生书局 影印本,1968),第 502 页。
- ④㉙民国 23 年《贵县志》卷 2,社会(台北,成文出版社 影印本,1967),第 291 页。
- ④㉚《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申办天地会首仇大 折》嘉庆 5 年 7 月初 1 日批,《天地会》(六)(中国人民大学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合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 416 - 417 页。
- ④㉛《谕两广总督吉庆将办理归善县添弟会滋事情形复奏》嘉庆 7 年 8 月 29 日,《天地会》(七),1988,第 6 页。
- ④㉜事件的展开过程参照俞長根,《19 世纪初中国东南部地域的天地会动向——以 1802 年的惠州反乱为中心》,《庆大史论》第 2 集,1986,第 86 - 91 页。
- ④㉝《广西巡抚百龄奏申办叶春芳等人折》嘉庆 9 年 5 月初十日批,《天地会》(七),第 162 - 163 页。
- ④㉞《广西巡抚恩長奏申办来贫县李太忠等结会折》嘉庆 14 年 3 月 17 日批,《天地会》(七),第 234 页。
- ④㉟《广西巡抚恩長奏申拟张世聪等人折》嘉庆 12 年 4 月 24 日批,《天地会》(七),第 186 页。
- ④㊱《广西巡抚恩長奏申明潘老草案内周宗胜等人折》嘉庆 13 年 3 月 24 日批,《天地会》(七),第 206 页。

- ⑤⑧ 1804年在广西博白组织天地会的廣 合浦人馮老四就是海贼出身。
- ⑥⑨ 《宣宗实录》卷 12, 16a - b, 道光元年正月壬戌条。
- ⑦⑩ 1808年足足有 54起的广西天地会组织事件, 1809年也有 21起天地会组织事件和掠夺事件。朴基水, 《道光年间广西民众起义的研究》, 成均馆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1992, 参照第 166 - 169页的表 - 1。
- ⑪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卷 22, 3a。
- ⑫朴基水, 《道光年间 (1821 - 1850)的广西民众起义》, 《溪村閔丙河神授停年纪念史学论丛》, 论丛刊行委员会, 1988, 第 528 - 529页。
- ⑬⑭ 《宣宗实录》卷 283, 38a, 道光 16年 5月辛丑条。
- ⑮⑯ 《史稿》卷 371, 列传 158 《邠土贡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8册, 第 11 - 14页。
- ⑰⑱ 《粤匪大略》, 《太平天国史料》(田余庆等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第 491页。另外在谢山居士, 《粤氛纪事》卷 1《粤西起事》2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文海出版社), 第 7页指出义勇一被解散, 他们结党结派躲在山谷里进行抢劫, 成为了被逮捕的对象。
- ⑲⑳ 赵烈文, 《能静居士日记》17,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第 287页。
- ㉑㉒ 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第 380页。
- ㉓㉔ 朴基水, 《道光年间广西民众起义的研究》, 第 196 - 97页。表 - 5。
- ㉕㉖ 同上, 第 198 - 199页, 表 - 6。
- ㉗㉘ 《宣宗实录》卷 12, 16ab, 道光元年正月壬戌条。
- ㉙㉚ 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卷 22, 5a。
- ㉛㉜ 《广西》上, 《乡约条规》第 24页, “民间山场地主, 嗣后只许批给本村人住村耕种, 不得贪图重价, 批卖与外省来历不明之人, 在于山僻处所, 搁棚架屋, 以致招引匪类, 难于稽查。”
- ㉝㉞ 黄体正, 《带江园杂著草》卷 5《保甲攻状》(《广西》上, 第 34页收录)
- ㉟㊱ 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第 380页说到“粤东水陆撤勇...。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 水陆行...。我估计广东的被解散的乡勇, 首先同在广西居住的广东客民结合起来, 之后以客民为媒介和广西土匪等联系起来。”
- ㊲㊳ 阮元, 《安徽巡抚钱公楷传》, 《碑传集》, 卷 74, 10a(钱仪吉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93辑, 文海出版社), 第 3573页。钱楷于嘉庆 14年 12月(1810. 1) - 15年 11月(1810. 12)之间担任广西巡抚。
- ㊴㊵ 民国 9年《桂平县志》, 卷 34《贤能传》《黄体正条》(台北, 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967), 第 1451页。
- ㊶㊷ 《乡约条规》道光元年(《广西》上, 第 19页)。根据《宣宗实录》卷 4, 25b, 嘉庆 25年 9月丙寅条, 广西巡抚赵慎畛上奏, 在和广东接壤的平乐、梧州府地方有匪徒出没。这一内容和在第二年(1821)制定的《乡约条规》中被指出的内容, 认为是同一事件。继而《乡约条规》所指的异省匪徒主要指广东人。
- ㊸㊹ 《宣宗实录》卷 179, 37ab, 道光 10年 11月乙丑条。
- ㊺㊻ 周天爵, 《致周二南书》,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第 3页。
- ㊼㊽ 民国 9年《桂平县志》卷 31《风俗》, 第 1148 - 1149页。
- ㊾㊿ 稻田 一, 《太平天国前夜の客民について》, 《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古屋大学)11, 1986, 第 80 - 81页。
- ㊽㊾ 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卷 22, 5a。
- ㊽㊿ 《乡约条规》道光元年(《广西》上, 第 19页)。
- ㊾㊿ 《宣宗实录》卷 135 23ab, 道光 8年 4月庚寅条。
- ㊿㊿ 《调查资料》, 第 266 - 269页。
- ㊿㊿ 至少拥有 100亩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或富人。
- ㊿㊿ 黄体正, 《带江园杂著草》卷 5《保甲攻状》(《广西》上, 第 34页收录)。
- ㊿㊿ 西川喜久子, 《广西社 与农民的存在形态》, 第 138页。
- ㊿㊿ 《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碑记》道光 24年 9月 9日, 《文献史料》, 第 341页。
- ㊿㊿ 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 《拜上帝会成立前金田地区的阶级斗争》, 《历史研究》1955年第 5期(《太平天国研究论集》第 1辑, 第 8 - 9页)。
- ㊿㊿ 把社仓的米谷当作种子贷出以保证农业生产, 但是也可以作为食量, 同时保障连种子也没有的贫农的农业生产, 认为是救济贫民的一个方法(《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碑记》道光 24年 9月 9日, 《文献史料》, 第 342 - 44页)。
- ㊿㊿ 民国 23年《贵县志》卷 2《社会·姓氏》, 第 280页说道“於粤东惠潮嘉进来者, 均谓之来客。广东的嘉应州、潮州、惠州一带因为是客家的居住地区, 这里的来客、客人就是指客家。”
- ㊿㊿ 民国 13年《永淳县志》卷 8(《广西》下, 第 320页)上, 把代纳壮族税粮的地主汉人表示为客家, 这不是作为宗族集团的客家而是指广东的客民。还有小封, 《抗租记》(《广西》下, 第 328页)上, 把代纳壮族税粮的地主汉人表示为客人, 这也不是指客家而是指客民。
- ㊿㊿ 在第 1个阶段, 为了躲避胡族的支配, 中原汉人从东晋时期开始到隋唐时期为止, 持续移动到安徽、河

- 南、湖北、江西等地。在第二个阶段,为了躲避黄巢叛乱(875-884),一直到宋代,中原汉人移住到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的东部边疆地区。在第三个阶段,以元朝南侵为阶梯,到明中叶为止,中原汉人再次移动到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在第四个阶段,因为客家居住地的人口增加,一部分客家自清朝康熙末年以來开始移住到四川地区,雍正年间,另一部分开始移住到广东中部的广州府、肇庆府一带,以及广西梧州府、潯州府一带,在乾隆年间向湖南南部或台湾移动。在第五个阶段,在广东中部肇庆府等地的客家因为咸丰6年(1856)-同治6年(1867)期间的大械斗再次向赤溪、海南岛等地移动。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古亭书屋,1975),第41-63页。刘仪宾也和罗香林一样对客家的移动情况进行了同样的说明。只是刘仪宾主张在五代以前的移动叫客家先民的移动。第二次移动之后客家先民移住到福建、广东、江西的是交界地区的山间地带,经过五代的动乱期,同外界绝缘,客家渐渐形成了和一般汉人有别的独立民系,到宋元交替期,客家的名称被确定下来。之后的三次移动同罗香林的见解大同小异[《汉族与客家》,《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1951;中川学,《华人社会と客家史研究の现代的课题》,《东南アジア华人社会の研究》上(戴国辉编,东京,アジア经济研究所,1974),第65页再引用]。
- ⑨6刘仪宾,《汉族与客家》,《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1951(林传芳,《客家と中国の近代》,《龙谷史坛》71,1976,第3页再引用)。
- ⑨7中川学,《华人社会と客家史研究の现代的课题》,《东南アジア华人社会の研究》上(戴国辉编,东京,アジア经济研究所,1974),第69-70页。
- ⑨8林传芳,《客家と中国の近代》,《龙谷史坛》71,1976,第6-12页。
- ⑨9菊池秀明,《金田团营前夜》(《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3号,1991,第13页)页举了明末向广西移住的客家的事例。另外,菊池秀明,《太平天国前夜の广西における移住と‘客籍’エリト》(《史学杂志》第101编第9号,1992,第17页)也举了明末向广西进出的客家莫村傅氏的事例。邢凤麟主张明末初以后客家从广东和邻省向广西移住。《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天国史事释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第73页。
- ⑩根据罗香林,上书,第61页,在雍正年间客家向广西移住。一方面菊池秀明认为从乾隆年间开始到道光年間客家的移住很集中。《金田团营前夜》,第8页)黎斐然等也认为在乾隆、嘉庆年间大量的客家

- 人从广东向广西移住。《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170页)
- ⑩罗香林,上书,第97-98页。一方面,根据梁辟村,《客家精神》,《客家文献碎金》(自銘编,新加坡,耶加达夫声日報社,1956收录;中川学编,《客家论の现代的构图》,东京,アジア政经学会,1980,第29页再引用。)在45个县有客家居住。徐杰舜,《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客家学研究》第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9-50页也指出1988年当时在广西的44个县有客家居住。
- ⑩罗香林,上书,第103页。一方面根据李运华,《为罗君香林述广西客家n》,《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4,1933(中川学编,上书,第29页再引用)广西人口的1/5是客家。一方面现在广西客家大概有350万名。徐杰舜,《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客家学研究》第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8页。
- ⑩《调查资料》,第3-4,44页。
- ⑩根据《调查资料》,第20页,从紫荆山三江到新墟的路是用他个人的资本筑成的。
- ⑩菊池秀明,《太平天国前夜の广西における移住と客籍エリト》,第25页。
- ⑩菊池秀明,《金田团营前夜》,第10页。王作新的祖上(曾祖父王达瑞)于乾隆19年(1754)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广西紫荆山。
- ⑩根据《恩平土客互斗緣由》,《未の秘密结社》,第243页,广东恩平的客家是耕种土著人土地的佃农。另据1920年农商部统计,广东客家最多的东江地方的6个县的农民有360,410,其中佃农111,075(30.8%),兼自耕的佃农136,985(38%),佃农和兼自耕的佃农占全体的68.8%[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の研究》,1932(宋文炳著,小口五郎译,《支那民族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4附录中收录。第338页]。
- ⑩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の研究》,第340页
- ⑩根据《贺县客匪扰害情形》附录《客匪伪示》,《未の秘密结社》,第240页,在广西贺县客家们耕种土著民的土地。
- ⑩《潯州府志》卷56(《广西》上,第99页);《调查资料》,第23,127页。
- ⑩《调查资料》,第192页。在桂林居住的客家中行商的很多。
- ⑩根据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73页,在1844年馮云山到达广西潯州府城后,投宿)老水的家。)老水是广东嘉应州客家出身,就是以此维持生计。
- ⑩小島晋治,《拜上帝社、拜上帝会と客家人の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1,1981,第118,120页。

- ① T. Hamburg, *The Visions of Hung Siu - 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根据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6,第868页,广西的匪贼(大体是天地会起义势力)中从广东来的客家很多。
- ② 《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曾文正公全集》1, (台北,世界书局,1985),第154页
- ③ 械斗从福建漳州府和泉州府开始,渐渐波及到广东,在广东潮州府特别严重。程含章,《论息斗书》,《皇朝经世文编》卷23《吏政:守令下》,51a。关于广东的械斗风潮参照徐珂编,《稗类钞》第5册《风俗类》,《粤西好斗》(北京,中华书局点本,1984),第207-208页。
- ④ 仁井田陞,《中国の同族部落の械斗》,《中国の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第364页。
- ⑤ 在1854年,广东客家也参加了广东天地会叛乱,由于天地会内部的本地人和客家对立,一部分客家势力脱离了天地会,甚至敌视天地会。水原敏博,《アヘン戦争後の广东の民衆运动》,《史潮》110,111,第32-33页。
- ⑥ 小島晋治,前面的论文,第121页强调了新移住客家被排斥在对于地方神的偶像崇拜之外。
- ⑦ 《调查资料》,第3-4页。
- ⑧ 《调查资料》,第44页。
- ⑨ 小島晋治,前面的论文,第119页。
- ⑩ 小島晋治,《客家と太平天国》,《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纪要》17,1985,第29页。
- ⑪ 他们被表示为客民、客,他们是纯粹的从他省移住来的汉族还是客家不太清楚。
- ⑫ 《调查资料》,第44页。
- ⑬ 《宣宗实录》卷378,15b-16a,道光22年7月己巳条。
- ⑭ 在客家或土著汉人、壮族的单一居住地区不发生土客械斗。邢凤麟,《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天国史事释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第73-74页。
- ⑮ 《黄尚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李丹折》咸丰元年9月23日,《文献史料》,第317页。
- ⑯ 《调查资料》,第43页。
- ⑰ 《调查资料》,第40页。
- ⑱ 在广西陆川县组织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的赖九是从福建汀州府经过广东潮州府翁源县移住到广西的客家的后裔。赖九在族内很单弱,家庭也很贫寒,平时受到同族的陆鰲村赖姓地主的藐视和凌蔑,心怀不满。由于赎不到粮谷,愤怒的赖九招集人们打开了赖姓地主的粮谷仓库(《调查资料》,第84-86,90-91页)。还有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地区的秀才王作新,他的曾祖父是乾隆年间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广西的客家地主。他同于1760年从广东潮州府揭

阳县移住到广西紫荆山大冲的客家曾开门一族由于土地问题发生了纷争(菊池秀明,《金田团营の前後》,第13页),而且把客家馮云山活动告到了官府。以上的事例说明了在客家主要居住地区的客家之间的矛盾和纠葛。客家和别的民族、种族杂居而与他们矛盾、对立的时候,客家族内的联合、团结特别强。因此可见客家的社会内部也不能避免阶级矛盾和阶级纠葛。

⑲ 民国9年《桂平县志》卷33,第1262-1263页。

⑳ 决定太平天国的宗教和组织的名称的根据是太平天国当事者内定的名称;时人对太平天国宗教和组织的称呼。既存的研究,大体是根据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 - Siu - 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1854)称为“拜上帝会”。例如,太平天国史的代表研究人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小島晋治[《太平天国革命の历史と思想》(东京,研文出版,1978)]、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等也这样说。所以根据一般的惯例在这里使用“拜上帝会”这一称呼。但是最近一部分研究者提出了“上帝会”这一名称的使用。中国的宗教组织的名称使用3个字,5个字的很多,4个字的不怎么用。(市古宙三,《洪秀全幻想》,东京,汲古书院,1989)韩国崔震奎教授支持这一观点(《太平天国和上帝教》,《东洋史学研究》55辑,1996)。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当事人李星沅的奏折中使用“尚弟会”、“尚地会”这一称呼(《李星沅等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伪示正筹进剿折》道光30年12月20日,《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珍事缘由折》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文献史料》,第82,87页),那么上帝会的称呼是妥当。因为尚字是在太平天国中由于忌讳上帝的上而被使用的用语,弟、地和帝的发音一样。

㉑ 罗尔纲,《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

㉒ 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44-73页。

11世祖 洪沿三公
12世祖 次子英纶 五子英纬
13世祖 长子 稗儒 次子 璨儒
14世祖 次子国游 长子 国荣
15世 次子 镜扬 长子 名扬
16世 三子 仁坤 五子 仁一

㉓ T. Hamburg, *The Visions of Hung Siu - 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1854;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6收录。

㉔ 参照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另外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

- 1965;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2),第336-345页的《花县洪氏宗谱》。
- ⑬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7-9页。
- ⑭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上,第69页。
- ⑮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30页。
- ⑯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第73-77页。王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14页。
- ⑰钟文典,上书,第79页,115-116页。冯云山当老师的书馆主人曾玉珍(客家)的舅舅是杨秀。
- ⑱《调查报告》,第74-75页。
- ⑲《调查资料》,第57,222页。
- ⑳《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光明日报》1956.5.10。[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收录],第311页。
- ㉑罗尔纲,《金田访记》,《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第337-338页。另外郭存孝,《宣城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石碑和族谱》,《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K3中国近代史》1982年第2期,第40页)。
- ㉒罗雄飞,《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K3中国近代史》1995年第1期,第30页)。
- ㉓《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2,第780页。
- ㉔民国9年《桂平县志》卷41纪人(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第1900页。
- ㉕王庆成,《石达开》(北京,三联书店,1980),第3页。又《调查报告》,第75页。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第229-230页。钟文典的实地调查。
- ㉖关于拜上帝会的成立和活动参考崔震奎,《关于上帝教的救世观的研究》(高丽大学大学院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1992.12)第4章第1节。
- ㉗在贵县太平军的参加者壮族最多,其次是客家。《调查资料》,第114页。
- ㉘《调查资料》,第112-114页。根据小島晋治,《拜上帝教、拜上帝会と客家人の关系》,第126页。客家赖九和黄文金率领的陆川的拜上帝教徒大多数(约5-6千)是客家。
- ㉙《调查资料》,第125页。罗尔纲,《金田访记》,《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第329页。太平天国的王杨秀是烧炭客家的领袖。
- ㉚贵县平天山的銀矿劳动者中客家很多,他们参加了拜上帝会。《调查资料》,第127页。
- ㉛《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2,第780页。
- ㉜T. Hamburg,《太平天国起义记》,第868页。《调查资料》,第41页。
- ㉝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第192页。
- ㉞他们由于长久械斗失去了家园,在寻找依靠的势力。石达开在贵县一起义,他们就投奔了石达开(《调查资料》,第115页)。石达开这时在组织贵县的矿山劳动者,客家和他们结合起来加入了拜上帝会[光绪20年《贵县志》卷6(《广西》上,第78页)]。
- ㉟罗尔纲,《金田起义考》,《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1955),第25页。
- ㊱《洪仁一自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2,第850页。
- ㊲洪仁发、洪仁达,《王长兄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文献汇编》2,第516页。
- ㊳关于拜上帝会的宗教,虽然使用拜上帝、上帝等用语,在这里称为上帝教。参照崔震奎,前引的学位论文,第4-5页。
- ㊴根据差大臣李星沅的报告,虽然太平军号称达到了万余人,实际兵力在7125名内外。如果加上被迫参加的男妇的话,就在2万内外。《李星沅奏抵广西日期及驰驻柳州等情折》道光30年12月初5日,《文献史料》,第78页。《会奏复现在贼首股数并请调云贵官兵折子》咸丰元年2月11日,《李文恭公(星沅)奏议》卷21第94页a-b(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312,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779-3780页)。
- 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245-246页。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 ㊶王庆成,《金田紫荆访古》,《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编辑部编,《复印报刊资料》K3《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81年第2期,第66-67页]。黎斐然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太平天国史新探》(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171页。